

#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 增 刊

第 四 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华民国史组编

中 华 书 局

1978年3月

258

644

#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 增刊

第四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华民国史组编

(征求意见稿)

中华书局

1978年3月

内部参考 注意保存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增刊

第四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华民国史组编

\*

中华书局排印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中国书店代发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1978年3月印刷 定价：0.80元

##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编印凡例

一、编印《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的目的仅在于组织协作，征求意见，反映工作进展情况。

二、《丛稿》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负责编辑。

三、《丛稿》专登有关中华民国史资料一类的稿件，供内部参考，不对外。每辑字数不定。

四、所有中华民国史初稿及其所附资料，一般都先在《丛稿》登载，广泛征求意见，然后改为定稿。但《丛稿》登载过的稿件，将来《中华民国史》一书及其所附资料不一定全都编进去。

五、欢迎投稿，但只限于中华民国史及有关资料。

六、欢迎对《丛稿》提出批评意见。

七、《丛稿》不对外展览借阅，所登文稿，不要转载和引用。

## 前 言

一九七二年八月，我们接受了编写《中华民国史》的任务。当即召开座谈会研究。经过反复讨论，大家一致认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述中国剥削制度社会最后一个朝代——中华民国的兴亡，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根据这一认识，我们提出了如下的初步设想：

一、编写《中华民国史》，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方针，绝不能因袭中国封建时代传统的修史方法。

二、写一部书，定名为《中华民国史》，拟分三编。

第一编 中华民国的创立(1905—1912年)

第二编 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1912—1927年)

第三编 蒋介石政府的反动统治(1927—1949年)

三、编三种资料：

第一种 《中华民国大事记》

第二种 《中华民国人物志》

第三种 《中华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有关人员组成筹备小组，开始进行工作，并约请一些单位的同志参加协作。

五、在适当时期，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会议，展开全国大协作。

我们随后把这个设想，写成一个报告向上级请示，很快就得到了有关领导同志的批准。

一九七二年九月，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了一个中华民国史组，共四十三人。分为大事记小组、人物志小组及政、经、文专题资料小组三个小组进行工作。

关于人物志，需要写传记的约一千人；列入人名辞典的约四千至五千人；另外还拟编制若干人物表。

如何写传记，我们毫无经验，只预先提出了几点要求：

一、要求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为一个人写传记，必须充分占有材料，认真进行研究。只有对这个人的一生有了总的概念、对他的主要言行有了具体的判断、并且这个概念和这些判断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然后才可以下笔。

二、要求用记叙文，不要写成评传。要通过具体的事实把正确的观点表现出来。不要离开事实材料，作过多的评论。对事实的取舍、详略以至措辞用字，都必须仔细斟酌，务求妥贴。

三、要求真实可信。传记中所写的事实，要经过反复核对，有的还要经过调查研究，务求做到确实无误。凡是有疑问而又查不清的，宁可写或不写，不要以讹传讹。

四、要求反映一个人全貌的同时又有重点。一个人的传记，要把他的家庭情况、上学情况、主要的经历和言行，总而言之，要把他的生平事迹如实地反映出来。但又不要写成流水帐或年谱。要把最能反映本质的事情，选其中最重要的一两件写得详细、生动些，其余的不妨简略。

五、要求用白话文写，文字要力求简练。不要用文言，也不要半文半白。没有必要就不要用引文，引文要注明出处。文字要简练，要把可有可无的字句删去。每篇以一、二千字为准，不要写得太长。

六、初稿后面，要附主要参考资料目录。

这几点要求，提得未必恰当。但实行起来，还是很难办到。现在我们已写成若干初稿，这里选印一些出来，征求意见，希望能得到各方面的批评指正！

从一开始，我们就认为编写《中华民国史》，非全国大协作不能成功。即以写人物传记而论，那个行业的人由那个行业的人来写最好，那个地方的人由那个地方的人来写最好。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不过是抛砖引玉而已。我们希望这批初稿，能引起各方面和全国各地方的兴趣，大家都来写，尤其是熟悉情况的人动手写，那么《中华民国史》就不难完成了。我们还希望从事史学工作的同志，不但自己动手写，而且要把有关这方面的组织工作承担起来。

## 目 录

上半生简述.....	高崇民遗著	( 1 )
重庆软禁琐记.....	高崇民遗著	( 13 )
我所知道的邓演达.....	陈卓凡	( 24 )
沈钧儒先生年表(1875—1963).....		( 41 )
回忆李公朴.....	张曼筠	( 63 )
李公朴先生年谱(1902—1946).....		(101)
一代报人——邵飘萍.....	汤修慧	(106)

# 上半生简述

高崇民遗著

编者按：高崇民遗著《上半生简述》、《重庆软禁琐记》，是高崇民的亲属提供的稿件。因系遗作，故照原样略予删节，未作修改，希读者注意。

余幼年时(八岁)家庭成分属于下中农，世居辽宁开原柴河沟靠山屯，清光绪末年，义和团事件后，由于我父曾欢迎义和团，天主教徒依仗外人势力，强迫我家搬出靠山屯，乃迁往大寨子落户。我随父亲东园公读私塾兼务农业。十八岁时考入奉天省立甲种学校(农林学堂)，廿岁时在奉天秘密加入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参与推翻清朝运动。同年慈母郭氏病逝，享年五十五岁。廿一岁我与元配李素质结婚，生长子高存信。在农林学堂五年，毕业后，余已廿三岁，以开原县公费生赴日本留学，考入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一九一九年毕业后回国。

辛亥革命，推倒清朝，建立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国旗为红黄蓝白黑五色，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改为国民党，当时成立一个形式上的议会政治，各党派为了争取议席，扩大党派，把官僚政客地主土豪，均吸收为党员，当时所谓国民党即是这样，余颇厌之，故未加入。直至一九二四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联苏，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我始参加。中山逝世，蒋介石背叛了新三民主义，对旧三民主义亦未实行。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阴谋，要作皇帝，与日本订立卖国条约十一条。孙中山为换取推翻袁世凯，一度主张把东三省让给日本，我在日本留学东京时，亲耳听到中山这种错误主张，表示坚决反对，黄兴当时也反对。



幸洪宪短命未能实现。

留日学生对袁世凯与日本订立卖国条约十一条大为愤激，推举代表回国分赴各省开群众大会，表示反对。我被推为到上海开大会代表之一，事后复返日本。当时出一弱国(中国)经一亡国(朝鲜)入一强国(日本)。对于弱国之所以弱，亡国之所以亡，强国之所以强，都显然可见。于是对祖国奋然有图强之志，不做所谓个人功名富贵之想。故回国后，即投入报界，在北京《正言报》(东北三省政府出资)充当编辑。因我在日本学的政治经济，意在宣传所学提供议会，以救中国的贫弱。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间，北洋军阀混战，奉天张作霖与直隶曹锟第一次战役，奉军失败，退出关外，余之政治愿望成了幻想，亦随军退出关外。

张作霖出关后，即实行割据，伪称东三省自治，自封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为了欺骗人民同时成立东三省民治俱进会，我为黑龙江省分会会长，后又调回奉天总会，约一年左右。一九二三年日本帝国主义续租旅顺、大连九十九年事件发生(先是由帝俄手转租给日本为卅年期满)，奉天省长亲日派大汉奸王永江预先通令各机关学校，不准表示反对意见。我用个人名义写一文章，散发各机关学校，词严义正地反对日本续租旅大。王永江大怒，但又怕掀起民愤，不敢公开对我施加罪名，暗令警察厅将我驱逐出境。因此我赴东北特别区之哈尔滨。

当时朱庆澜为特区行政长官，马忠骏为特区市政管理局长兼交涉局总办，袁金凯为中东铁路理事长。由袁推荐我为市政管理局督学兼教育科长。市内有崇德女子中学一所，朱庆澜夫人徐××任校长。我视察该校时比较认真，徐校长误会我对于该校教员要去旧换新，竟率领男女教员罢工，控告于朱长官面前。余不知朱已指斥徐校长而支持我之视察，马忠骏局长找我谈，我说明为了要了解特区教育情况，以便有所改进，无换人之意。马乃一面安慰我，一面将朱长官斥责徐校长的话告诉我，心才平静。后来朱长官对我始终很好，可见其正直。

亲日派大汉奸于冲汉接任特区长官时，委任储镇接市政管理局长。一日，储找我面谈，拟任余为绥芬河市政分局局长，说：你不是久居人下

的人，所以打算提升你(实际明升暗降)，并且你是袁金凯的人应当照顾(谁是谁的人，旧官场中流行这种无耻的话)。我当时脱口而出说：局长您是谁的人吾不知道，我是吾爹吾妈的人，不是袁金凯的人。储红着脸说：“你这家伙简直是骂大街”，外任也就作罢。以后亲日派汉奸张焕相接任特区长官。储对张极尽谄媚之能事。不久特区成立教育会，余兼任教育会长。为筹措教育会会产做为基金事，储从中作梗，我写一告会员书，宣布事实真相。储乘机向张焕相长官告发我为共产党人，将我押在特区警务处，我虽在教育会掩护过地下共产党人，但查无证据，无法判罪。旧官府错拿不错放，不得已于一九二七年以我借端滋事名义予以押解回籍、严加管束的处分。

解到奉天时，省长已换为刘尚清，不是大汉奸王永江了，刘以我无罪立即释放。一九二八年，奉天警务处长陈徽五委我为警官学校教育长，同年元配李氏四十四岁病逝于沈阳，余乃续娶曾昭惠为妻，体弱无嗣。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奉天成立农务会，推我为会长，奉天商会会长丁极辰，副会长杜重远邀余兼任工商联合会总务长。商会著名恶棍李福堂经年捣乱，丁、杜为了整顿商会，特呈请张作霖大元帅批准改组商会，刘尚清省长亦同意改组商会，因按新章重新选举，报请省政府和实业厅立案。后张作霖由北京回奉天在皇姑屯车站被日本人炸死。李福堂乘机控告丁、杜违章(指旧章)选举，而省政府和实业厅竟推翻前案，命令商会取消改组，仍照旧章办理。丁、杜与我商议对策，余谓张学良新继任保安总司令，用人唯亲，当然要去旧换新，待我给您写一诉状，保证告倒一个省长，一个厅长，结果不出所料。丁对余大加赞赏，认为有勇有谋，特荐之于东三省兵工厂总办杨宇霆，杨又转荐于张学良总司令，我始为保安总部张的秘书。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有“九·一八”事变，从此我下定决心，誓作收复东北运动，不作任何官吏。“九·一八”事变发生第七天，我潜行入关，到北京后，见张学良申明来意，张准予辞去秘书之职，

每月支付生活及活动费现洋三百元。

一九三一年九月底，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北京成立，我被推为常务委员兼总务部副部长，掌管对关外义勇军发放钱款事宜。同年十一月国民党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所谓中央政府）与胡汉民的广东政府在上海开宁粤和谈会议，平津两地学生结成队伍赴沪请愿。我为东北学生队伍指挥之一。到达上海时，宁粤分赃会议已告结束，乃转赴南京，向所谓中央政府请愿。蒋介石在中央军校接见，前后左右布满军警，排列机关枪数十架，以示威严。东北学生队伍在军校礼堂讲台前边，距蒋甚近，我首先质问蒋说：东北易帜（取消五色旗，挂国民党旗），促成国家全面统一，接着又摧毁阎、冯、汪等扩大会议，使中央政府转危为安，自问无负于国家。乃上海宁粤会谈，对东北之失竟一句未提。胡汉民却对我们说，国家之强弱不在领土之大小。不知东北究何负于国家，中央政府是否还要东北，请明白指示。蒋听到逆耳的话，面色青白，一时说不出话，只听这个之，这个之……。半天才说：中央是要东北的，最短时期一定收复东北，仅说这两句话，就面向天津学生队伍说：东北青年因家乡失掉，感情激动，来京请愿，是可以理解的。你们天津并未丢失，也来京请愿，显然是不相信中央政府……，蒋话还未说完，天津学生代表大声呼道：委员长，东北是中国的东北，天津青年不能对东北之失隔岸观火，坐视不救。我们来京请愿正是相信中央，否则我们就到广东政府请愿去咧。蒋看势不好，转身躲入室内，由旁人敷衍这次接见。请愿无结果而终。

一九三三年，我在北平写两本小册子，一名《三民主义的真谛》，大意说明革命的三民主义，反对蒋介石挂羊头卖狗肉。一名《东北魂》，大意说明东北人是强悍的，绝不甘心作亡国奴，言外国民党不要东北，东北人民是要收复东北的。“九·一八”后，我一直决心做收复东北的工作，除在抗日救国会搞义勇军而外，并培植东北青年学军事，作打回老家去的准备。先令余当时之独生子高存信，从开原乡下来北平，投考中央军校，托在北平的东北文武官员徐士达，王以哲为保证人。当时余已知蒋

介石密令中央军校的前身，黄浦时期的毕业生戴笠、邓文仪、康泽、贺衷寒等成立一个法西斯组织，命名复兴社，蒋自任社长，余告诫存信不要加入，因为不是余培植他的目的，当时还不知其为特务组织与否。

一九三三年蒋介石因失掉东北，为了逃避责任，用舍车保将的手段，迫令张学良下野，出游意大利，派亲日派大汉奸何应钦接任北平军分会。何贼唯日本之命是听，竟下令解散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我与救国会原负责人王化一、陈先舟、杜超杰等，秘密组织一个复东会，继续宣传抗日。蒋介石当时误以为是张学良授意组织的，故未加追查。张学良一九三四年于意大利回国后，蒋便中问到张学良，张虽根本不知道这个组织，但认为蒋既注意，是不放心这个组织，不如把它取消，另和蒋的亲信干部共同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因找王化一、王卓然到汉口征询意见，王等竟出卖复东会，擅自以张的使命到南昌报告蒋介石。蒋大为高兴，立即令贺衷寒、刘健群等与二王研究具体方案，结果拟定一个叫四维学会，蒋为名誉会长，张学良为名誉理事长，贺为理事长，王卓然为副理事长，刘健群为秘书长，另外设十五名理事，王化一和我都在内。于是张学良、贺衷寒在汉口银行公会召开成立大会。四维学会成立约两个月左右，蒋令十五名理事到南昌听训，原来蒋之目的只在取消复东会，并不需要一个新的团体组织，因此蒋的训话是借口胡汉民的反对，令把四维学会绝对秘密起来，以后不准用四维学会的名义作任何活动。这番训话完全把四维学会无形取消了。在汉口成立会上，贺衷寒主张要承认蒋是中国唯一的领袖，要绝对拥护，绝对服从。余与贺有争论，中途退席（杜超杰亦随之退席），然而当时受环境所迫，为了救亡活动，不能同时得罪蒋、张二人，因吉林同乡吴涤愆的劝解，终于参加四维学会。

一九三四年，家父病逝于开原乡下，忧时致疾遗憾而终，我在北平举行望祭，执礼尽哀。（参看高东园先生哀挽录）

日本侵占热河之后，于一九三五年又进攻华北，蒋介石仍抱不抵抗主义，仍继续“剿共”。当时我在汉口大声疾呼，主张要一致对外抗日。

贺衷寒特在黎天才家召开座谈会，我和王化一等参加。贺旁若无人地说：“我们应以领袖的意志为意志，个人不能有所主张，我们服从领袖应象迷信神一样，丝毫不能动摇，否则怎算拥护领袖呢？主张抗日简直是狗屁！”当场骂街，我不能忍，乃起立说：“我拥护领袖是为了抗日，我们的口号根本是拥护中央收复东北，因为他有抗日的力量……”贺未等我说完，立即质问说：“那么领袖无力量，你就不拥护吗？”我说：“那是当然的，否则我怎不拥护街上站岗的警察呢？领袖毕竟是人，而不是神，只有活混蛋才迷信神！”针锋相对，我亦骂街。贺不料我敢骂他，气得说不出话来，经黎天才、王化一等解围，不欢而散，因此我拂袖而去上海。

一九三五年五、六月间到上海后，经杜重远介绍一个共产党地下党员，叫宋介农（后改名孙达生），年纪虽轻，马列主义很熟，此为我第一次正式见到共产党人。宋为我介绍马列主义小册子看，我初步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应走的政治道路，宋可算我启蒙的老师。以后杜重远又介绍两位左派人士胡愈之、邹韬奋。他们商议叫我去西安，力阻张学良不要随蒋打内战。同年七、八月间，我由上海回北方，带着重要使命，经天津、北平，将在沪所得，密告陈先舟、刘兴沛两位留日本时同学，又密访中共地下党负责同志王梓木。此时我更清楚蒋介石背叛新三民主义的所谓中国国民党，因而毅然将党证焚毁，表示决心与蒋家党脱离，为了利于革命活动，未正式声明。从此我即一直跟着共产党走。

同年十月下旬到达西安，持杜重远的信，通过杜斌丞先见杨虎城将军，然后去访张学良副司令（东北易帜后，蒋封张为海陆空副司令）。张知我既与贺衷寒闹翻而去，此来必有所陈，特单独接见，且不在楼下会客室，让到楼上他的寝室外屋。我直言不讳说：蒋用尽全部兵力，“剿共”八年，亦未如愿，今红军北上抗日，乃令东北军来西北围剿，是有阴谋的。共产党固然是蒋所欲消灭而甘心者，但东北军是地方实力，非蒋嫡系，亦在排斥之列。此次围剿两败俱伤是蒋的最大愿望，否则伤哪一边都是蒋的胜利，这是蒋的阴谋所在。而且副司令不要用旧眼光视红军为流寇，今天的共产党决非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可比，万不可仗恃东

北军兵多饷足，武器精良，就可以战胜少数红军。须知共产党是有马列主义的党，是根据马列主义要建立一个新型的国家，是从广大人民利益出发，所以百姓欢迎。红军到任何地方，都和老百姓成一家人，如鱼得水。按道理是不应该剿的，按力量也剿不完，因为国军不能把老百姓都消灭净尽。反之，所谓国军都在阴面，一举一动红军从老百姓口中知道最清楚，故能用种种战术以少击众（直罗镇和大小劳山战役证实我的话），副司令应权衡轻重，斟酌利害，是保存东北军实力，收复东北老家呢？还是随蒋内战同归于尽？我说完，张的态度很沉静，问我说：如果东北军不“剿共”怎能抗日呢？言外是自己走不上抗日的道路。我当时未明白张的意思，竟答非所问。张乃告我十七路军杨虎城对东北军的误会，并付予我解除误会的任务，说：解除误会方能成大事。余乃第二次见杨虎城，披肝沥胆，痛切陈述张的深谋远虑，绝无对西北有取而代之的意图。杨听毕极为高兴，由此张、杨实际合作，暗中进行联共，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下，逐渐形成三位一体。

一九三六年上半年，我在西安写一本小册子，名叫《活路》，驳七日亡国的唯武器论，反对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政策。国民党反动派发现后，下令通缉。当时我在洛川之东北军王以哲、刘多荃部队里，张学良令王和刘秘密派人将我送到天津，遂未被捕。我由天津化装赴沪，向胡愈之、杜重远等汇报工作，认为付我之任务相当成功。

同年八月张、杨分别派人到天津、上海秘密接我回陕西。回陕后，不能公开出面，先住三原东里堡杨虎城公馆，约两个月后潜入西安，住杨的军需处王处长家，张、杨有时深夜与我相见，直至“双一二”事变，始公开住进绥靖公署。蒋介石在临潼被扣押到西安绥靖公署时，张约见蒋，我始终不肯，但当时我同意不杀害他，是考虑杀蒋后，三位一体的力量不能控制当时中国的局面，大汉奸汪精卫、何应钦等，必勾结日本祸乱中国。故我坚决赞成中共与张学良和平解决的原则，以争取早日对外。事变之夜我到绥署时，张笑说：秀才来了，要起个名称表明我们今天的举动。我讲古代鬻拳兵谏的故事，张极为满意，以后在文字上对于扣蒋

事,即称兵谏。西安事变中,我得识今总理周恩来同志和叶剑英、李克农二位同志,十分敬仰。

一九三七年二月底,东北军高级将领于学忠、何柱国、缪澂流等,决定东北军东调,这是迎合蒋介石的心愿,从个人私心出发。加以东北军的少壮派应德田、孙铭久等掀起内讧,枪杀王以哲军长,为他们所借口(参看余所写《西安事变杂谈》)。三七年三月初,刘多荃由高陵送我到临潼上火车,并派其副官护到北平。东北军既起内讧东调之后,蒋介石对于乙案也不执行(先是蒋令执行甲案,三位一体都还在西北),此时仅派于学忠为淮海警备司令。余由北平赴开封,通过刘多荃面见陈诚说:这样做东北军家属无处安置,因而大失东北军心。陈向蒋报告,始改令于学忠为江苏绥靖主任,东北军家属得以安置。西安事变经过多次险阻,幸还有共产党红军这一体健在,终于达到和平结束,加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革命人民努力斗争,然后才使国民党反动派勉强走上对外抗日的道路。

西安事变结束以后,刘澜波、陈先舟、卢广绩、栗又文(由新疆归)等陆续回到北平,我建议还须要组织一个救亡团体,经在平津上海酝酿两个月时间,于五月底六月初在北平成立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总)。成立一个月左右,日本攻打芦沟桥事变发生,自此抗日战争逐步形成。天津失守,东总由北平迁往南京(原拟迁上海,行至山东济南,因“八·一三”战起而止)。余在同年八月八日离开北京,经天津到山东济南,同行有韩立如。山东韩复榘设宴招待到济南的救亡人士,我和韩立如均被邀出席。韩立如与我住一个旅馆,韩给其北京友人写信用个假名,经查出引起侦察队的误会,我两人遂被拘留,幸当时东北系于学忠军长在济南,给韩复榘打电话,上午被拘,下午即放。此时东总虽到南京,但我不拟前往,乃转赴山西太原。上海战起,东总忽然发生存在与否的问题。原来国民党反动派 CC 团,是打击东总的,复兴社戴笠是想拉拢我们,故支持东总。此时戴认为已全面抗战,东总不必要存在了。这时我尚在山西太原,刘澜波到太原找我去南京。因与王化一在敌机炮火之下,赴上海

找戴笠交涉，我说明存在的必要后，戴又赞成东总存在，并捐助开办费二千元，在戴是别有用心的，在东总为了避免CC分子说是中共的外围组织，故不能拒绝任何人的捐款，只有将计就计地受下。上海失守，东总得中共地下党组织指示，随国民党政府退到武昌，在明月桥办公。因形势变化的需要，这时东总不能不吸收王化一、王卓然二人正式加入（因出卖复东会事，开始未邀他们），遂由常委会推选主席团七人，有王化一、王卓然、阎宝航、卢广绩（都是张学良的亲信）、高崇民、陈先舟、车向忱。在三八年初，我大儿子高存信欲赴陕北学游击战从事抗日，我很同意，在武汉给他办理了去延安的介绍信，特到郑州交给他。然后我又赴西安成立东总陕西分会，胡圣一在西安（胡是长安税捐局长）大力支持。自此，我虽基本常住西安，因为常跑各地方，未直接负责西安分会事宜。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余在西安主要任务是负责介绍东北青年赴延安学习，当时主要是为打日本。余在一九三六年以后，一直认为内地旧的大学校，一方面是培植压迫和剥削人民的帮凶，一方面是培养个人功名富贵升官发财的思想，是误害青年的场所，故不赞成在内地入国民党的所谓大学。默中总是鼓动东北青年赴陕北学习，方能真正走到抗日的路上。三八年八月间，我一度赴延安见毛主席，并与周恩来同志商谈可否在八路军掩护下，组织东北干部支队。如能成立近几万人的干部支队，对于收复东北是很大的新生力量。在延安住十二天返回西安。值余续妻曾昭惠患精神病甚重，曾没有亲生子女，我特令存信于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回西安探望，以示安慰。存信回西安后，由于缺乏白区工作经验，见到两个从延安早出来的学生，对他很注意。我知道后，当即令其搬入八路军办事处。第二天，侦缉队去我家搜捕他而未得到，即将我带至侦缉队，追问我为什么把高存信送到延安。我说不是我送的，他是由中央军校毕业后从部队去的。然后他们说这是一个误会，遂将我放回，我在侦缉队共住三天。

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为大势所迫，不得不勉强对外抗日，然而总以未贯彻他的反动政策为憾，故念念不忘与中共和抗日人



民为敌，因而不断通过汉奸与日本谋妥协，与中共搞磨擦。一九三九年冬，先后将东总的洛阳和陕西两地分会无理查封。在咸阳设立集中营，截堵赴延安学习的青年。自此余在西安介绍青年的任务遭受十分困难，因而于一九四〇年秋避居凤翔。所以八年抗日战争，一面是对外民族斗争，一面是对内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我在一九四六年三月间，到东北解放区安东省时，写一篇文章，题为《惨胜归来》，意思说对外抗日斗争是胜利了，但对国内反动派斗争的艰苦是很惨的，而且谁胜谁负尚未确定。

一九四一年盛世才反苏反共。先是盛割据新疆，联苏联共。后因希特勒进攻苏联，打到莫斯科附近，认为苏联不行了，盛乃叛变投降蒋介石。其胞弟盛世骥(新军旅长)和杜重远极力反对。盛世才暗杀其胞弟，诬杜重远与汪精卫有勾结，逮捕入狱。我与盛函电争辩，最后盛邀我去新疆，为了营救杜重远我拟赴新疆。戴笠知我将赴新，特告王化一函我先到重庆再去。我到重庆，戴竟以蒋介石之意，不叫我去新疆。我即想回陕西，戴亦公然不许，我始知被骗，自此被软禁在重庆五年。因限我不准离开重庆市，方拟接余妻曾昭惠来重庆，不料她精神病犯，在凤翔服药自杀而死。一九四一年冬我在重庆与王桂珊结婚，戴知我无他去之意，大为高兴，赠送礼仪二千元，我知其意，亦将计就计受下。一九四二年，盛世才为了迎合蒋介石，电请中央派员复审杜重远案件，蒋派东北人王德溥等赴新，王临行对我说：必携重远生还（王亦是重远好友）。最后却判重远死刑，王升为蒋的内务部次长。我写诗一首，语意双关（杜去新，朋友多不赞成）。诗谓：满腔热血赴边陲，虎尾功名计已非，三字沉冤成定讞，有人博得侍郎归（次长旧称侍郎）。

一九四二年秋，东总被国民党反动派取消，不能再用东总名义做救亡活动，余乃在重庆嘉陵江南岸猫儿石，我的住宅门上挂起《反攻》半月刊社的牌子(单独立案的)，因经济限制改为不定期刊物，直至一九四五年，在日本投降后之“九·一八”那天，才宣告正式停刊。在《反攻》担任编辑的，前后有秦笠、胡循、邹勇策、孙汉超、聂长林、刘砥方等，另外余